

# 探寻消逝的古国

——观“呦呦鹿鸣——燕国公主眼里的霸国”展

本报记者 吴艳丽

视线

2007年,继山西发现曲沃县北赵墓地的晋侯墓葬、绛县横水墓地的邰国墓葬之后,西周考古学史上又一次重大发现——山西翼城县大河口墓地,再次轰动了考古界:这里或许是一个在浩瀚史书中没有留下丝毫印迹的西周封国——霸国。风格独特的葬俗、数量惊人的随葬品、精美的漆木器、目前中原地区发现最早的漆木人俑、填补史籍记载空白的青铜器铭文以及珍稀的原始瓷器……掀起了世人探知的欲望——“霸”是一个国家吗?它是怎样的一个国家?存在了多久?又何以隐蔽了近3000年……

正在首都博物馆举办的展览“呦呦鹿鸣——燕国公主眼里的霸国”试图给出答案。展览由该馆与山西博物院、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联合主办,180余件(组)出土文物,从周礼的视角,辅佐文献,叩响了那神秘的千年回声。

## 从阙载到发现

历史上,很多失落的文明随着文物的出土而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与“霸”相关的一切也是如此。

2007年,因大河口墓地被盗,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对其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并发现了大量带有“霸”字铭文的青铜器:“霸伯彝”铭文作“霸伯作宝尊”、“铜豆”有铭文“霸伯作太庙宝尊彝”等,同时,在一个铜簋的盖子内面,发现有铭文“霸中作旅彝”。“中”通“仲”。伯、仲、叔、季,在古时有兄弟排名之意,故考古队推测,“霸”字应该是这片土地的国名或族名。

不仅是“霸”字,在出土的青铜器上,考古队还发现了带有“燕侯旨”的铭文。“燕侯”是指西周封国燕国国君,当时燕国都城的地理位置,目前所知位于北京房山区的琉璃河遗址,所以山西大河口地带不可能是燕国的所在。由于大河口墓地在晋国国都翼城附近,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和专家认为,“邰”和“霸”都不是国家,它们最有可能是文献中记载的“怀姓九宗”中的两宗,也就是分赐给晋国始祖唐叔虞的媿姓狄人,甚至还有专家提出,“邰”和“霸”都是晋国的采邑,即周天子封赐给晋侯作为世禄的田邑。

对于这些观点,主持此次考古发掘的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谢尧亮并不完全认同。早在邰国墓葬发掘时,考古队已对“邰国”的归属进行了研究。从邰国墓葬的个别大墓在礼制严格的西周使用墓道,大墓基本都有独立陪葬的车马坑且大多陪葬有丰富的青铜器、玉器,以及青铜器上的铭文,可知邰国具有相对独立的外交和内政,并与周王室及其他国家有一定的往来关系,它应该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国家。再将大河口墓地的墓葬形式和随葬品与北赵墓地、横水墓地进行对比,它不仅也有独立的车马坑,且有些墓葬的随葬物品数量甚至超过了晋侯墓,更有原始瓷器、金器等珍稀的外来品,这都不是一般贵族能拥有和用以随葬的奢侈品。另外,《史记·晋世家》记载晋国最初“方百里”,如果把“邰”“霸”作为晋国的一部分,显然已超出“方百里”的范围。同时,在大河口墓地可以看到当时周文化的影响和其独立发展的印迹,这片区域应该拥有独立的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自治权,有着独立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以及宗教信仰。综合以上因素,谢尧亮认为



▲西周早期·玉鹿



▲西周中期·霸伯彝



▲西周早期·燕侯旨尊



▲西周中期·鸟形盃



▼西周中期·铜人顶盃

为“霸”和“邰”一样也应是相对独立的国家的国名。

兴盛于西周早中期,衰落于西周后期,消亡于春秋早期,霸国存在了300余年——这是大河口考古队综合墓地整体情况得出的结论。1000余座墓葬,也说明当时的霸国应该人口较少、面积方五十里或三十里,它或许就是西周1000多个分封国中的一个二等小国。

## 从个体到群体

西周早期,为了维持长治久安,各封国除了壮大自己的国力外,也很重视与周王室及周边国家的往来。在霸国所处的山西晋南地区,就有20余个西周封国,霸国处于怎样的地位?它与周王室及周边封国的关系如何?又用什么方式进行交流?这些在铸有“燕侯旨”铭文的器物等出土文物中或可寻得蛛丝马迹。

大河口墓地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霸伯墓葬。根据种种迹象,考古队判定霸伯是霸国的国君。大量的燕侯作器埋藏在霸伯墓葬中,在考古队看来,这不是一般的助祭之器所能解释的,也不可能是分赐、掠夺得来的,赠送的唯一途径可能就是两国联

姻。展厅入口处的一件西周早期“青铜卣”,在盖内和器底都铸有铭文“燕侯旨作媿妹宝尊彝”,即燕侯旨给他嫁到霸国的“姊妹”(小姑姑)专门制作的青铜礼器。燕侯旨是燕国第一任国君——召公奭儿子燕侯克之子或是弟弟,史界尚无定论。从1号大墓的年代来判断,谢尧亮认为,似乎“姊妹”为召公奭的女儿,是克之子比较合理。这些器物不但大大丰富了铸有“燕侯旨”铭文的青铜器,也将霸国和燕国联系在了一起——燕国公主或许正是嫁给了霸伯。

除此之外,霸国也与其他国家有密切的往来:展览的“三足簋”盖内壁和器底铭文“芮公舍霸马两玉金用铸簋”,显示出霸伯与周王室重臣芮公之间通过赐器方式的往来;“尚孟”铭文“唯三月,王使伯考蔑尚历……霸伯拜、稽首,对扬王休,用作宝盃,孙子子其万年永宝”,还原了周王室对霸国进行赏赐的场景。同时,存世的一件“晋侯铜人”散膝上有铭文“唯五月,淮夷伐格,晋侯搏戎……”研究证明“格”通“霸”,这说明晋国与霸国有着密切的关系;故官藏的“邰生簋”铭文说了格伯用良马四匹换取邰生30田的故事,显示出霸国

与邰国之间的交往……

可见,霸国不仅与周边封国,甚至与周王室及远方的诸侯国也有着密切的往来。在这种交流中,霸国可能在300余年的发展过程中处于一种稳定的状态,而霸国与诸侯国之间的文化关系及霸国的地位也随着考古研究的推进而渐渐清晰。

## 从细节到格局

当古老的夏商周在传世文献中留下文明足迹的同时,其漫长的历史也给人留下了太多的未知数。这也许是霸国近3000年来从未闯入人们视野的原因所在——或是因为西周有众多像霸国这样的小国,或是因为关于霸国的记载在漫长的历史流传中遗失了。而今,伴随着考古发掘和考古研究,一些失落已久的历史细节也渐渐呈现出来。

青铜器在西周早期是地位的象征,从带有“燕侯旨”铭文的青铜器出现在霸伯墓,而非是燕国公主的墓中,可以推断霸伯的地位要高于其夫人。目前,在大河口墓地发现的霸伯墓葬有6座,其中西周早中期的1号大墓中,70余件青铜礼器以及大量的玉器、漆木器、原始瓷器等将墓室塞得满满当当,从这些资源的丰足,可知霸伯地位的显赫,以及当时这一区域实力的雄厚。

此外,出土的文物还显示出当时这里等级明确、礼制严格。《礼记·昏义》:“夫礼始于冠,本于昏,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于射乡,此礼之大体也。”霸国人的行为准则、政治理想和伦理道德都被规范其中。与商“殉人”的陪葬制度不同,大河口墓地只有“殉狗”,出土的两件脚踏乌龟的“漆木人俑”,也体现着霸国有着较为文明的陪葬制度以及“事死如生”的丧葬原则;雕琢精美的“三联璜组玉佩”显示出君王对祭礼的恭敬;各种青铜食器、青铜乐器以及青铜酒器,则反映了霸国宴饮用乐的精神追求以及严格的等级制度等。同时,墓葬也出土了一些令人惊叹的器物:“鸟形盃”的发现,为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增加了一种新器形;墓葬棺盖上铺有2万枚象征地位和财富的中国古代货币——海贝,这在西周墓葬是第一次发现;“铜人顶盃”可能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青铜灯。

种种遗迹让我们得以窥见霸国曾经的辉煌和他们励精图治的梦想。其实早在此前,带“霸”字铭文的青铜器,已见于《殷周金文集成》等文字著录及晋侯墓地出土的一件铸有“霸伯作宝尊彝”铭文的铜簋。这意味着大河口墓地的发掘和有关“霸国”的考证,为之前在其他各处发现的“霸”器找到了真正的归宿。

历史潮流滚滚向前。春秋早期,或许正是在晋国称霸的大肆扩张中,霸国被其兼并了。纵然霸国梦没能延续下去,但时隔近3000年后,今人仍可真切地触碰到那段真实的历史。也正是无数个被探寻、还原出的历史细节,串联起来形成了一个大的历史格局,丰富并不断更新着我们对于历史和当下生活的认知。追寻着这些文明的足迹,身处茫茫宇宙之中的人们,在与古人超越时空的对话中,当感天地之宽阔、生命之绵长,人类历史精神文明之丰厚。这或许就是今天考古发掘、考古研究与学术展览的意义所在吧。



浙江省宁波博物馆藏有一件国内罕见的唐代“越窑青瓷荷叶带托茶盏”。此件唐代茶具为1975年宁波市和义路码头遗址出土,由茶盏和盂托组合而成,胎质细密,釉色青翠,莹润欲滴。

带托茶盏通体高6.6厘米,口径11.8厘米,足径6.6厘米。茶盏为敞口五曲荷花形,腹部弧形且压印五条棱线,圈足。盂托四边微微卷起,浅腹,圈足。茶盏与盂托相结合,宛若一片风中的荷叶托着一朵盛开的荷花,在清波涟漪的水面上随风飘荡。

“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宵盛沆瀣,共稽中散斗遗杯。”唐陆龟蒙《秘色越器》诗中始见“越窑”之名,然越窑是我国古代历史最悠久、影响最为广泛的瓷窑体系,不仅是汉六朝中国南北瓷业之翘楚,亦为唐代六大名窑之魁首。越窑是对浙江东北部宁绍一带宋以前瓷窑的统称,其自东汉创烧成熟瓷器,先后经历三国西晋之鼎盛期、唐五代之全盛期,至北宋晚期趋于衰落。现慈溪上林湖区域则是自唐代开始越窑的中心窑场,唐宋时期朝廷先后在此设立“贡窑”和“置官监窑”,大量烧制“秘色瓷”。

唐五代时期是越窑发展的巅峰,代表了青瓷的最高水平。茶圣陆羽在其《茶经》中认为:“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洪州次。”唐人更是对越窑青瓷不吝赞美之词:孟郊《凭周况先举于朝贤乞茶》有“蒙茗玉花尽,越瓯荷叶空”,施肩吾《蜀茗词》有“越碗初盛蜀茗新,薄烟轻处搅来匀”,皮日休《茶瓯》诗云:“邢窑与越人,皆能造兹器。圆似月魂堕,轻如云魄起。”匠因茶而幽深青翠,茶因瓯而飘香绕梁,在饮茶之风盛行的唐代,类冰似玉的越窑青瓷与浓郁茶香相得益彰,为唐人品茗增添了无穷的高雅情趣。

唐代越窑青瓷讲究器形的丰富多样和线条的柔和匀称,且以概括提炼瓜果花叶造型为最显著的时代特征。这件“越窑青瓷荷叶带托茶盏”,其荷叶造型不仅是唐诗人“越瓯荷叶空”的生动写照,也反映了受唐代时代风尚和审美情趣影响下的越窑青瓷崇尚自然、注重生活情趣的时代风格,给人以自由、舒展、活泼、亲切之感。而其细腻之胎质、均匀之釉层、浑厚莹润之手感,亦充分展示了越窑青瓷“如冰类玉”之特点。从釉色上看,此件茶盏釉色青黄,与法门寺出土的“秘色瓷”兼具青绿和黄绿两种釉色不谋而合,且同样釉色莹润、色泽光亮。可以说,“越窑青瓷荷叶带托茶盏”很好地诠释了越窑青瓷形和胎骨“圆似月魂堕,轻如云魄起”、瓷质和釉色“姿如圭璧,色如烟岚”这一独特的意境,为越窑青瓷中上品之作。

越窑青瓷不仅在国内深受上层官僚贵族和下层劳动人民的普遍喜爱,而且也成为唐五代宋初中国外销的重要商品之一。依托于宁波这一“海上丝绸之路”主要始发港,越窑青瓷至迟在东晋时期已随僧侣商人输往海外,唐代开始大规模输出,晚唐至北宋达到了外销的鼎盛。1975年,与这件“越窑青瓷荷叶带托茶盏”同时出土的还有其他大量的越窑青瓷。经研究,和义路码头以及宁波东门口码头、古江厦码头都是当时重要的海运码头。在这些码头及码头附近出土的越窑青瓷,都是准备通过“海上丝绸之路”销往国外的产品。

而与之相对应,从目前发现的海外遗存来看,越窑青瓷分布在太平洋西海岸和印度洋、阿拉伯海沿岸亚非国家和地区的中世纪的都城、枢纽港口、贸易集散地遗址,佛教、伊斯兰教的寺院和祭祀遗址,以及宫殿建筑和贵族墓葬遗址等,形成了朝鲜半岛南部、西南海岸和东南亚,日本九州、京都、奈良,泰国马来半岛东海岸、南部,马来半岛沿海地区,印度尼西亚爪哇、苏门答腊、苏拉威西、加里曼丹岛及其他岛屿,菲律宾吕宋、棉兰老、巴布延、民都洛、宿务以及和乐、卡加延苏禄等岛屿,印度洋印度洋海岸,斯里兰卡西北部,巴基斯坦西南海岸和印度河畔,伊朗波斯湾海岸及境内,伊拉克底格里斯河流域,阿拉伯波斯湾沿岸,阿曼湾,埃及红海沿岸和古都福斯塔特,苏丹红海沿岸,肯尼亚东南海岸及海域,坦桑尼亚基尔瓦岛等亚非国家和地区在内的庞大的越窑青瓷贸易网络。

可以说,越窑青瓷是我国最早大批量销往海外的贸易陶瓷。随着越窑青瓷的大量外销,制瓷技术也随之外传,并影响了地制瓷业和制瓷技术的发展。正是由于越窑制瓷技术的无保留传播,朝鲜半岛的高丽青瓷在短短时间内迅速赶上甚至超越越窑青瓷,并一度向越窑青瓷发源地浙东地区输出。日本的制陶业也模仿越窑青瓷,名古岳东边的猿投窑烧制的器物在造型、釉色、纹饰上都与越窑相似。而在9世纪至10世纪越窑青瓷大量输入的埃及,也仿越州窑瓷,到11世纪,其仿制的陶器在器形、釉色、刻划纹饰上与越窑青瓷已经十分相似。

因此,这件“越窑青瓷荷叶带托茶盏”不仅是越窑青瓷的珍品,出土于海运码头的它,更是见证了越窑青瓷扬帆海外的辉煌和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脉动。



帆影茗韵·越窑青瓷荷叶带托茶盏

宁波博物馆馆员 莫意达

# 鲁迅收藏的“大同十一年砖”砚

葛涛



在北京鲁迅博物馆收藏的鲁迅所用过的物品中,有一个用“大同十一年砖”制成的砚台(见上图)。据有关人士回忆,这个砚台当时就常放在鲁迅西三条住所的“老虎尾巴”书房中的书桌右上方。作为鲁迅收藏、使用的物品,这个砚台在1962年被定为一级文物。

根据文物档案的记录,这个用古砖制成的砚台长21.5厘米,宽17厘米,高8厘米;砖的上、下方分别嵌有紫檀木的盖和托,砖

迅喜欢收集古砖,所以就将从故乡得来的这个古砖制成的砚台送给鲁迅,鲁迅也因此判断这个古砖出土于浙江嵊县。鲁迅文中所说的“刻”,是西汉时期设立的一个县的名称,位置在今浙江嵊州西南,鲁迅在这里用“刻”来指代浙江嵊县。另外,有研究者用近年出版的《古刻汉六朝画像砖》一书中所收录的刻有“大同十一年作”的古砖与鲁迅收藏的这个古砖比对,发现两者几乎完全一样,由此也可以确认这个古砖确实是从浙江嵊县出土的。

除此之外,这个砖砚还有一侧刻有文字“大同十一年作”,另两侧分别刻有花纹。“大同十一年”是指南朝梁武帝大同十一年,即公元545年。

鲁迅在1918年7月14日的日记中记:“拓大同砖二分(份)。”后来,鲁迅又把这个“大同十一年砖”的拓片收录进他在1924年编辑的《侯堂专文杂集》之中,并在该书稿的目录中注:“大同十一年专”已制为砚 商契衡持来 盖刻中物。”商契衡是鲁迅的学生,浙江嵊县(今嵊州)人,他知道鲁

迅喜欢收集古砖,所以就将从故乡得来的这个古砖制成的砚台送给鲁迅,鲁迅也因此判断这个古砖出土于浙江嵊县。

迅喜欢收集古砖,所以就将从故乡得来的这个古砖制成的砚台送给鲁迅,鲁迅也因此判断这个古砖出土于浙江嵊县。鲁迅文中所说的“刻”,是西汉时期设立的一个县的名称,位置在今浙江嵊州西南,鲁迅在这里用“刻”来指代浙江嵊县。另外,有研究者用近年出版的《古刻汉六朝画像砖》一书中所收录的刻有“大同十一年作”的古砖与鲁迅收藏的这个古砖比对,发现两者几乎完全一样,由此也可以确认这个古砖确实是从浙江嵊县出土的。

除此之外,这个砖砚还有一侧刻有文字“大同十一年作”,另两侧分别刻有花纹。“大同十一年”是指南朝梁武帝大同十一年,即公元545年。

鲁迅在1918年7月14日的日记中记:“拓大同砖二分(份)。”后来,鲁迅又把这个“大同十一年砖”的拓片收录进他在1924年编辑的《侯堂专文杂集》之中,并在该书稿的目录中注:“大同十一年专”已制为砚 商契衡持来 盖刻中物。”商契衡是鲁迅的学生,浙江嵊县(今嵊州)人,他知道鲁

迅喜欢收集古砖,所以就将从故乡得来的这个古砖制成的砚台送给鲁迅,鲁迅也因此判断这个古砖出土于浙江嵊县。

迅喜欢收集古砖,所以就将从故乡得来的这个古砖制成的砚台送给鲁迅,鲁迅也因此判断这个古砖出土于浙江嵊县。鲁迅文中所说的“刻”,是西汉时期设立的一个县的名称,位置在今浙江嵊州西南,鲁迅在这里用“刻”来指代浙江嵊县。另外,有研究者用近年出版的《古刻汉六朝画像砖》一书中所收录的刻有“大同十一年作”的古砖与鲁迅收藏的这个古砖比对,发现两者几乎完全一样,由此也可以确认这个古砖确实是从浙江嵊县出土的。

除此之外,这个砖砚还有一侧刻有文字“大同十一年作”,另两侧分别刻有花纹。“大同十一年”是指南朝梁武帝大同十一年,即公元545年。

鲁迅在1918年7月14日的日记中记:“拓大同砖二分(份)。”后来,鲁迅又把这个“大同十一年砖”的拓片收录进他在1924年编辑的《侯堂专文杂集》之中,并在该书稿的目录中注:“大同十一年专”已制为砚 商契衡持来 盖刻中物。”商契衡是鲁迅的学生,浙江嵊县(今嵊州)人,他知道鲁

迅喜欢收集古砖,所以就将从故乡得来的这个古砖制成的砚台送给鲁迅,鲁迅也因此判断这个古砖出土于浙江嵊县。

迅喜欢收集古砖,所以就将从故乡得来的这个古砖制成的砚台送给鲁迅,鲁迅也因此判断这个古砖出土于浙江嵊县。鲁迅文中所说的“刻”,是西汉时期设立的一个县的名称,位置在今浙江嵊州西南,鲁迅在这里用“刻”来指代浙江嵊县。另外,有研究者用近年出版的《古刻汉六朝画像砖》一书中所收录的刻有“大同十一年作”的古砖与鲁迅收藏的这个古砖比对,发现两者几乎完全一样,由此也可以确认这个古砖确实是从浙江嵊县出土的。

除此之外,这个砖砚还有一侧刻有文字“大同十一年作”,另两侧分别刻有花纹。“大同十一年”是指南朝梁武帝大同十一年,即公元545年。

鲁迅在1918年7月14日的日记中记:“拓大同砖二分(份)。”后来,鲁迅又把这个“大同十一年砖”的拓片收录进他在1924年编辑的《侯堂专文杂集》之中,并在该书稿的目录中注:“大同十一年专”已制为砚 商契衡持来 盖刻中物。”商契衡是鲁迅的学生,浙江嵊县(今嵊州)人,他知道鲁



▼“大同十一年砖”砚侧面拓片



查看更多内容,请用手机扫描二维码。

收藏 电子信箱: shoucang@peopledaily.com.cn

扫描二维码,可订阅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 rmbwby。